

回溯与前瞻:多维视角下的三线建设研究述评

张 勇

(四川外国语大学 社会与法学院,重庆 400031)

摘要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三线建设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研究热点,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研究视角趋于多元。在宏观层面,学界主要从全国和整体性的角度探讨了三线建设的原因与背景、实施过程、调整改造、评价与影响等问题;在中观层面,从区域的角度重点研究了三线建设与工业布局、城市化发展以及小三线建设等问题;在微观层面,主要从历史事件及影响、社会生活、三线人群等方面做了较为集中的专题研究。此外,三线遗产研究成为新的增长点;相关理论研究尚显薄弱;国外对三线建设的研究相对较少。未来对三线建设的研究,可从资料的搜集与利用、研究内容的拓宽与深化、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提升、研究团队的打造以及与社会界合作等方面予以突破。

关键词 三线建设;多维视角;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 K273,K92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92(2020)02-0135-08

三线建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64年起在中西部地区进行的一场以备战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它横贯三个五年计划,投入2 052.68亿元巨资,建成了1 945家中大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1]。三线建设持续时间较长,建设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调整改造结束于21世纪初。它对我国的国防安全、经济布局、社会发展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由于保密等原因,有关三线建设的文献资料出版较少,对其所作的学术研究也不多。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一系列文献资料的解密和出版,对三线建设这一重大事件的研究开始浮出水面,此后随着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出台,三线建设领域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研究热点。目前,学界已整理了大批关于三线建设的文献资料,并出版了多部学术专著,发表了400多篇期刊论文,还有40余篇硕博学位论文;有10余项包括重大项目在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获批立项;

近两年各地先后举行了多场以三线建设研究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这表明三线建设研究已得到蓬勃发展,并引起学界广泛重视。众多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对三线建设领域的相关问题展开研究,研究成果日益丰富,研究趋向深入。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多维视角对三线建设的研究现状进行回顾与总结,并为以后的研究提出相应的建议与展望,以期推动三线建设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一、宏观视角的三线建设研究

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学术界对三线建设的研究更多从宏观层面即全国和整体性的角度来探讨三线建设有关问题,成果也较为丰富。

学界从宏观视野对三线建设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1)三线建设的原因及背景。备战和改变工业布局被认为是实施三线建设的两个主要原因。还有学者提出,优先发展重工业、“反修防修”的考虑也是实行三线建设的原因^[2]。大部分学者倾向于从多方面因素来综合分析三线建设

作者简介 张 勇,四川外国语大学社会与法学院教授、三线建设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史、中国当代史、历史社会学。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公众历史记录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9ZDA194)。

的起因。(2)三线建设的实施过程。对于全国三线建设的实施过程,以陈东林、何郝炬、李彩华等人在其著作中所作的论述最为全面。对于各省三线建设的实施情况,地方文献也分别有详略不等的叙述。(3)三线建设的调整改造。早在1990年,就有研究者肯定了调整改造所取得的一些初步成效,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并对以后的调整改造提出若干改进意见^[3]。此后,陈东林、李彩华、卢周来、晁丽华等学者从多个角度对调整改造进行了探讨。(4)三线建设的评价与影响。早期学界对三线建设的历史评价褒贬不一,争论较多;后来更多学者持辩证的观点,认为三线建设成效显著,但也有不足之处,逐渐从绝对肯定或否定向更全面、辩证的评价转变。对于三线建设的影响效应,学者们大多综合分析三线建设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认为对国防安全、工业布局、城市发展、社会文化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5)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三线建设,把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加以比较研究,想通过总结三线建设的经验教训,为西部大开发提供参考借鉴。(6)三线建设与领导人。三线建设中领袖人物的相关研究得到了重视,研究者分别对毛泽东、邓小平、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李富春等领导人关于三线建设的决策、思想及活动进行了论述^①。

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当属出版的四部专著。林凌和李树桂主编的《中国三线生产布局问题研究》^[4]最早专门研究三线建设中的经济布局,对三线建设的总体布局,国防科技工业的布局,三线生产布局的基本特征、作用及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该书更多是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工业布局问题,对社会、文化、环境等问题没有关注。陈东林所著的《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5]是第一部分系统研究三线建设的专著。此书主要从宏观上对三线建设的决策背景、实施过程、成就与失误,以及通过与西部大开发的对比,论述在西部大开发中如何借鉴三线建设的经验教训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但较少从微观角度进行研究。何郝炬、何仁仲、向嘉贵主编的《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6]从三线建设的决策、成就以及经验教训出发,对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与意义进行比较。此书还论述了9个省区三线建设的历史,并提出了各省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构想。但该书对三线建设更

多是资料性的介绍,深度略显不够。李彩华所著的《三线建设研究》^[7]是另一部比较系统研究三线建设的著作,从三线建设的决策、历史成就、调整改造、历史经验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同时,此书还探讨了西部大开发与三线建设的关系,比较了三线建设与二战时期美国西部经济发展的异同。这些著述厘清了三线建设的一些基本问题,为后续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基础。此后,尽管也有一些学者从宏观层面探讨了三线建设的相关问题,但多为“老调重弹”,具有创新性的突破较少。

二、中观视角的三线建设研究

中观视角的研究,即从区域的角度来研究三线建设。三线建设包括“大三线”和“小三线”建设,范围几乎涵盖全国的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目前,学界的研究范围已涉及了大部分三线建设地区。20世纪90年代对三线建设的区域研究已然不少,但基本是对某一地区三线建设情况的梳理和回顾。21世纪以来区域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且研究渐趋多元和深入。

西南地区是大三线建设最重要的地区,其中川渝地区又是西南地区的重点,因而学界对川渝地区的研究相对较多。例如,宁志一分析了三线建设对四川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影响^[8],张凤琦探讨了三线建设对重庆城市现代化的影响^[9],周明长深入探讨了三线建设对四川城市现代化带来的影响^[10]。王毅先后对重庆和四川的军工企业、化工企业、机械工业、冶金工业等工业布局以及搬迁职工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②。对于川渝地区,学界主要从三线建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对城市化的影响及三线工业布局等方面进行研究。贵州是西南仅次于川渝地区的另一重点研究区域。张才良考察了贵州三线建设的缘起和发展历程^[11]。王佳翠论述了贵州遵义在国防、能源、机械、冶金等工业行业的建设情况,以及对交通、教育、医疗、卫生的影响^[12]。周明长研究了三线建设对贵州城市化的影响,认为三线建设开启了贵州省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新进程^[13]。

西北地区是大三线建设的另一重要地区,学者对陕西、甘肃、宁夏等地的三线建设都作了相关的研究。其中,孙燕京着重考察了三线建设对陕西工业的影响^[14]。汪红娟对甘肃三线建设的原因、基本情况、经验教训进行了论述^[15]。段伟对甘肃天水市三线建设的由来、地理分布、改造及启示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并着重分析了天水三线企业的选址问题^[16]。周明长探讨了三线建设对宁夏城市化发展的影响^[17]。此外,有学者分别对云南、青海、广西、湖北的三线建设进行了研究,但这些地区的研究相对较少,且不够深入,对湖南、河南、山西三线建设的研究则更为少见。

学界还对上海、安徽、江西、河北、福建、辽宁、北京等地的小三线建设进行了回顾和研究。其中,影响最大、成果最多的是上海大学徐有威团队对上海、安徽等地小三线建设所作的研究,他们在广泛收集资料和深入口述访谈的基础上,发表了20多篇论文,并出版了《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一至五辑)等多部著作。对于一线的东北地区,周明长考察了三线建设对东北和三线地区城市发展的影响^[18],黄巍则集中对辽宁地区在支援大三线、建设小三线历史进程中的重要角色和作用作了深入探讨^[19]。

目前从中观视角对三线建设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几方面:第一,三线建设的工业布局,以王毅的研究为代表,她分别从机械工业、军工企业、化工企业、冶金工业等方面对川渝地区的工业布局进行了系统研究;第二,三线建设与区域城市化发展,以周明长的研究为代表,他分别就四川、德阳、贵州、宁夏、东北等地三线建设对当地城市化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第三,小三线建设的研究,以徐有威团队为代表,对上海、安徽等地小三线建设的经济、社会、婚姻、文化、环境进行了综合研究。总体来看,从区域角度研究三线建设的成果颇为丰厚,但缺乏对不同地区三线建设的比较研究。

三、微观视角的三线建设研究

近十年来,随着三线建设研究的深入发展,并受社会史“眼光向下”、关注民众等思潮的影响,部分学者在宏观叙事之外,从微观层面着手对某一较小区域、某一企业或某一人群进行研究。这些微观研究的研究范围(或对象)不论是区域、企业还是人群,都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往往围绕着三线建设中的某一具体问题展开专题研究。目前,学界在三线建设的历史事件及影响、社会生活、三线人群等方面所作的微观研究较为集中。

三线建设进程中的一些历史事件及其原因、影响等,始终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之一。和宏观研究不同的是,微观研究者常常选择某一具体对象进行针对性较强的个案研究。例如,段伟以安徽宁国县

为考察中心,探讨了当地小三线建设的发展历程及其对地方经济的影响^[20]。胡悦晗以湖北襄阳三线企业4504厂档案材料为基础,结合对该厂职工的访谈,细致考察了该厂的筹建过程,探讨了三线企业的管理模式^[21]。他还以中部地区的两个工厂为例,深入考察了三线建设调整改造阶段工厂迁入城市的问题,认为地缘、利益与关系网络是决定工厂搬迁的三个关键因素^[22]。徐有威、李云以上海小三线新光金属厂为个案,全面论述了新光金属厂在调整改造时期面临的困境及重新回归上海的历史过程^[23]。张勇以四川彭县的三家工厂为例,考察三线企业的厂址环境与选址变化、变更厂址的博弈过程和行动策略、中央—地方—企业的关系及作用,尝试将微观视角与宏观视野结合进行综合研究^[24]。

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往往能反映出更为丰富而立体的历史面向。近些年部分学者从社会生活史的角度,对三线建设相关问题展开专题研究。付令以重庆青山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为例,分析了三线企业的社会特征及其表现^[25]。张秀莉从日常生活、婚姻、教育、医疗等角度,研究了皖南上海小三线建设职工的民生问题^[26]。徐有威、李云以上海小三线八五钢厂为例,考察该厂青年工人婚姻危机产生、解决的过程及其结果,分析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三线企业面对婚姻危机时的表现和应对^[27]。郭旭以饮食生活为切入口,探讨三线职工的社会生活状况,认为饮食生活体现了相对平等的价值观和时代烙印^[28]。王毅从工资、物价、劳动福利、生活物资供应等方面探讨三线内迁职工面临的社会生活问题,以及相关部门针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措施^[29]。

对于三线建设中的人物,早期学界对与三线建设相关的领导人的研究较多,而对三线建设的主体——普通建设者的关注不够。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聚焦于普通的三线建设者,并深入各地进行口述采访,因而涌现出许多三线建设的口述史及回忆录,为研究提供了第一手鲜活的历史资料。目前学界对三线建设中的三线职工、三线移民、家属工以及“半边户”家庭等群体进行了专题研究。其中,陈超以其博士论文为基础,出版了英文著作《宽容:一个三线企业中的小组治理》^[30]。该书以四川一家三线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聚焦车间生产组长对工人的日常控制,深入剖析三线企业中的群体关系和组织生态。这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出版的第一部以三线企

业为个案研究的学术专著,研究甚为深入,可谓微观研究的扛鼎之作。还有学者分别探讨了东北地区三线“家属工”的集体记忆与身份实践^[31]、身份认同与社会建构^[32]等问题。

在三线建设的这些群体中,三线移民是参与建设的主体,因而成为了学界研究的重点对象之一。陈熙、徐有威从人口迁徙的角度,对上海皖南小三线移民的动员、迁入、安置、回城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上海小三线移民最终未能在当地生根^[33]。林楠、张勇以重庆某厂为例,探讨三线建设移民二代地域身份认同的分化、影响因素以及表现等问题^[34]。袁世超、马万利考察了宁夏三线建设移民的迁移历程和民族融合等问题^[35]。张勇以川渝地区为重点,考察了三线移民的内迁准备与迁徙过程、去留抉择、身份认同等问题^[36]。张勇还剖析了三线移民的文化适应及变迁,认为三线移民在内迁后通过社会文化的调适,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三线移民文化和厂矿文化。社会与文化上的区隔,使得建设时期的三线移民并未真正融入当地,直到改革开放之后,三线移民才逐渐融入当地社会^[37]。目前学界对三线移民的研究集中在迁徙过程、社会生活及文化等方面,更多的研究议题有待进一步挖掘。

和三线建设的宏大叙事相比,微观研究的问题意识更为明显,研究主题更为多样化,研究更为精细而深入,有分量的成果也开始增多。当然,在三线建设微观研究的成果中,同样存在所谓“碎片化”的问题,在进行个案研究时缺乏广阔视野和整体考量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四、其他视角的三线建设研究

(一)三线遗产研究

三线建设兴建了1 945家大中型工矿企业和科研院所,遗留下大量的物质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界近10年来对三线工业遗产的研究渐趋增多,使其成为三线建设领域的又一研究热点。历史学、地理学、建筑学、城乡规划、旅游管理等多个学科的研究者分别从整体和区域的角度,对三线遗产的概念与类型、调查现状、价值评价以及保护利用等问题进行考察。

三线工业遗产属于工业遗产中的一种类型,但又有其自身的特点。研究者在世界遗产和工业遗产的框架体系下,对三线工业遗产概念、类型与价值作了整体性的分析。徐嵩林、陈东林合作撰文,论述了

三线遗产的概念、类型和评价标准等基本问题,研究具有开拓意义^[38]。陈东林还提出,可抓住当前供给侧改革和军民融合战略的机遇,为遗址保护和利用提供条件,并建议将这些遗址使用权下放到最需要的乡镇^[39]。吕建昌分别从城乡区位和功能用途两个角度考察了不同类型的三线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现状,并提出了开展三线工业遗产普查、拓宽资金渠道、整合资源发展旅游业、推进三线博物馆建设等多项有针对性的策略^[40]。

更多学者对三线工业遗产的研究,则是以区域为中心进行遗产调查、价值评估以及保护策略与再利用模式的探讨。其中,对三线建设重点区域——西南地区的研究较多。例如,刘瀚熙对原川东和黔北部分三线单位旧址的分布和现状进行了实地调查,在此基础上进行价值评价和保护利用的可行性研究^[41]。刘凤凌结合重庆特有的长江三峡特色,提出通过构建工业遗产廊道的途径,实现对船舶工业遗产的整体保护与利用^[42]。任泳东通过对贵州省绥阳县三线工业遗产的实例分析,指出当前三线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的现实困境,并深入探讨了三线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的模式^[43]。此外,湖北、青海、山东等地的三线工业遗产也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左琰、朱晓明、杨来申的著作以青海光明化工厂为案例,通过政府、学者、职工和社会的多方合作形式,探索促进西部经济发展和保存三线记忆相结合的创新实践模式,是理论与实践结合度高的一部著作^[44]。

在已有三线工业遗产的研究基础上,还有学者基于三线建设的特殊性拓展了三线遗产的内涵。谭刚毅等从工业考古学的角度,指出三线遗产包括以工业遗产为主体的三线建设的文化线路、建成环境遗产、工业遗产、建筑景观等核心物质文化遗产,以及相关建设过程、工艺流程、生产技能等文化表现形式,口传记忆、集体形制和时代精神等非物质文化遗产^[45]。如此,将工艺技能、口传记忆、三线精神等多项要素都纳入遗产的范畴中,拓宽了三线遗产的时空类型。

总体而言,学界对三线遗产的研究大体形成了两种学科路径:一是以陈东林、吕建昌为代表的学者,主要从历史学、文博学的角度来研究遗产的类型与价值;二是以谭刚毅、左琰为代表的学者,从建筑学、城乡规划学的角度来考察遗产的环境、建筑与评估体系。虽然学科视角不同,但都强调对三线遗产

进行合理的保护和利用,具有应用研究的显著特点。

三线遗产已引起了地方政府、相关企业以及学术界的重视。一些地方对三线工业遗产进行开发和利用,如重庆涪陵的816地下核工程已打造成景区并对外开放,贵州遵义利用长征十二厂的原址修建了1964文化创意园。2018年在上海举办的“中英当代工业遗产:价值及保护与利用”学术会议,重点议题便是探讨三线工业遗产的相关问题;2019年在湖北宜昌召开的“记忆与遗产:三线建设研究高峰论坛”,70余篇会议论文中有约1/3专门研究三线遗产问题。这表明三线遗产研究正逐渐成为三线建设研究领域新的增长点,预计未来会有更多的成果涌现。

(二)相关理论研究

理论是促使学术研究得以深化和持续发展的动力。虽然三线建设的相关研究成果数量众多,但大部分都倾向于进行事实与现象的叙述和分析,从理论层面深入探讨的成果相对阙如。在为数不多涉及理论分析的成果中,学者往往运用或借鉴相关学科的某一理论进行专题研究。例如,刘有安运用人类学的文化孤岛理论,分析了三线移民的社会文化适应问题^[46]。林楠、张勇借用社会学中的生命历程理论,将个体因素与社会、历史因素相结合,研究三线建设移民二代的地域身份认同问题^[34]。陈超运用关系网络理论剖析三线企业工人内部的群体关系与人际互动^[30]。周明长运用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城镇体系理论探讨三线建设对城市化的影响。张勇从公众史学的角度,考察三线建设领域的历史书写问题,指出学者、政府人员、媒体人、“三线人”等群体有着各自不同的书写动因、方式、作用和特点,学者同“三线人”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对双方都产生了影响^[47]。这些研究在探讨三线建设的具体问题时,仅仅将相关学科的理论作为一种分析手段。

近年来,有少数学者尝试进行三线建设研究领域理论的进一步探索。张勇基于该领域理论研究薄弱的现状,指出可以借鉴、运用社会史以及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来深化三线建设研究^[48]。继而,他将社会学的单位制理论引入三线建设研究领域,并结合三线企业调整改造的历史,指出一些三线企业正逐渐从“单位社会”向“社区社会”转变^[49]。在建筑学界,谭刚毅等国内学者和英国学者萨姆·雅各布、程婧如合作,引入“集体形制”概念来探讨中国的单位大院、人民公社和三线建设厂矿的社会模式、组织

机制与空间形式,将社会学的“单位制”理论运用到建筑学、城乡规划学中分析其建成环境与空间形态,为三线建设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③。

(三)国外对三线建设的研究

早期国外学者多从经济史和战备史的角度研究三线建设。美国学者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利用公开出版的资料,最早从经济史的角度指出三线建设意义深远,它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巨大^[50]。日本学者丸川知雄提出三线建设仅仅考虑了国防需要,牺牲了经济合理性,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来说是条弯路^[51]。日本学者吴晓林将三线建设作为毛泽东时代后期发展战略的代表,分析三线建设历史背景、决策过程、实施过程、内容、作用及其效果,论述其在中国现代经济史上的历史地位^[52]。加拿大学者吕德量(Lorenz Lüthi)则从军事史的角度,认为三线建设的缘起是越南战争,中国领导人误解了斯大林1941年对德策略,但是他们还是从中吸取了有益的教训^[53]。这些学者的研究更多从宏观的经济史和军事史的角度探讨三线建设的缘由、影响等问题,但囿于资料收集等条件的限制,研究尚不够具体和深入。

近几年,始有少数海外学者在实地调研和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对三线建设的某些具体问题展开深入探讨。例如,美国学者柯尚哲(Covell Meyskens)提出,三线铁路一开始就存在诸多问题,但最终将中国西部的大部分地区与全国工业网络紧密地连为一体,并且加速了区域交通体系的建设,促进了区域交通体系的标准化^④。匈牙利学者李菊(Li Ju)的著作以四川一家三线企业为对象,通过对其20世纪60年代至21世纪初转型过程的研究,分析当代中国社会发生的变革及其与现代性的关系^[54]。海外学者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深入的理论分析,对国内学者的研究具有一定启发性。当然,国外学者由于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对三线建设的研究仍然相对较少。

五、总结与前瞻

通过对过去尤其是最近十年研究成果的回顾,可以看出三线建设的文献资料日益增多,研究成果持续涌现,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视角趋于多元,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整体来看,近十年学界对三线建设的研究呈现两个显著的变化趋势:一是从之前的以宏观研究为主转变为如今宏观、中观、微观研究兼具的格局。不过,目前宏观层面的成果重复

性研究较多,具有创新性的突破较少;对区域(中观)的研究虽然覆盖了大部分三线建设地区,但缺乏对不同地区之间的比较研究;微观的个案研究开始增多,但整体性的视野有待加强。二是从以历史学为主逐渐向多学科、交叉学科研究转变。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政治学在三线建设领域都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建筑学、城乡规划学、人类学、语言学、艺术学,以及文化遗产、旅游管理等其他学科也开始涉足这一领域。但是,不同学科之间缺少密切的交流与合作。此外,对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探讨较少,使得很多成果的研究不够深入,有影响的成果尚不多见。可见,三线建设领域的研究仍有较大提升和发展的空间。

鉴于此,笔者认为未来三线建设的研究可从以下几方面予以突破。

第一,全面搜集、整理和综合利用各类资料。有关三线建设的资料众多,系统搜集并整理各类资料是研究深入开展的基础。研究者应搜集全国各地、各级地方政府档案部门所藏档案文件,以及有关企事业单位所存资料,流散各处的资料、报刊,个人所存笔记、日记、信函、回忆录、思想汇报、鉴定、表格,研究者所作的口述史资料和调研札记等。可以按地区和类别进行整理,并选出部分资料编辑出版,以搭建三线建设研究的公共平台,使三线建设资料库更为系统和完备。在研究时,应改变之前仅利用一两类资料即进行专题研究的状况,尽量综合利用多种类型的资料,注意将口述资料与档案文件、文献资料相结合,如此才能更好地还原和理解历史的真实面貌,作好实证研究。

第二,拓宽与深化研究内容。一方面,需拓宽三线建设领域的研究范围。除了以往学界关注的三线建设的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工业史和国防史研究,还可开拓三线建设中的科学技术、人口迁移、城市发展、社会变迁、国际关系等专题研究,增加对三线建设中其他相关人群(如民工、工程兵、职工家属)的研究,并将三线建设纳入20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整体视角下,加强三线建设与工业化进程、三线建设与区域城市化、三线建设与移民文化、环境变迁和城乡关系等领域的研究。另一方面,应重视研究的深入性,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尝试进行更多有深度的研究。例如,可以从微观层面选择某些企业或者某些人群作为研究对象,从组织结构、工作协作、社

会关系、日常生活、文化娱乐、土客互动等角度进行深入挖掘,以小见大地管窥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变迁。

第三,加强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探讨。理论与方法是学术研究持续发展的基石。目前三线建设的研究成果虽多,但进行理论和方法探讨的论著却很少。除了单位制和关系网络等少数理论之外,学界在进行三线建设研究时整体缺少理论支撑,长远来看将制约该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应充分运用或借鉴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地理学和建筑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积极进行理论层面的探索与突破,在一些专题中将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相结合,改变研究手段单一的状况,提升该领域研究的理论水平。

第四,打造研究团队和平台,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良好的研究团队和学术环境是研究发展的重要支撑。目前在中国国史学会下成立了三线建设研究分会,各大学已相继成立研究机构(如四川外国语大学的三线建设与社会发展研究所、上海大学的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中心、三峡大学的三线建设研究中心),开始组建若干研究团队。但大部分研究者仍处于“散兵作战”的状态,研究队伍缺乏长期的稳定性。如何加强不同地区、不同院校学者之间的互动与合作,形成联系紧密、相对稳定的研究队伍,如何增进不同学科研究者之间的碰撞与交流,形成相互借鉴、互有启发的学术环境,这应是今后学界共同思考的话题。

第五,兼顾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增强学界与社会界的合作。作为中国当代的一场重大历史事件,三线建设对当今社会仍有深刻的影响,部分三线企业和大量“三线人”依然存在,且面临诸多方面的现实问题。学界应将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相连接,在夯实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重视应用型研究,除了三线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还可继续开拓其他领域的应用研究,发挥学术研究经世致用之功能。另外,还需加强学界与政府部门、文化机构(如博物馆、文化公司)、三线企业、“三线人”以及普通公众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如此,既有助于学者调研的顺利开展和资料信息的收集,促进研究者与亲历者之间形成多渠道的对话;又可引导更多的社会公众参与到三线建设等当代史领域的记录与书写中来,促进学者与普通公众的互动^[47];还能利用和整合社会各方

的力量,发挥学术研究服务社会的现实作用。

通过资料的全面搜集与综合利用、研究内容的拓宽与深化、研究理论与方法的突破、研究团队的打造以及与社会各界合作等方面的努力,三线建设研究有望在未来发展成中国当代史和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研究领域。这种以重大问题为导向,突破学科之间的藩篱,打通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兼顾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寻求学界与业界合作的创新研究模式,或许可为当代中国研究探寻一条新的研究路径^⑤。

注释:

①详情参见张勇:《社会史视野中的三线建设研究》,《甘肃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②参见王毅:《三线建设中的重庆军工企业发展与布局》,《军事历史研究》2014年第4期;王毅:《三线建设中重庆化工企业发展与布局初探》,《党史研究与教学》2015年第2期;王毅:《三线建设中川渝地区机械企业发展与布局初探》,《开发研究》2016年第3期;王毅:《三线建设中川渝地区冶金企业发展与布局探析》,《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王毅、钟谔智:《三线企业的搬迁对内迁职工生活的影响——以重庆的工资、物价为例》,《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4期。

③参见《新建筑》2018年第5期专栏“集体形制之远去与归来”的多篇文章,其中谭刚毅论文为《中国集体形制及其建成环境与空间意志探隐》。

④Covell Meyskens, “Third Front Railroads and Industrial Modernity in Late Maoist China,”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Vol.40, No.3 (October 2015), pp.238-260. 中文版参见柯尚哲著,周明长翻译:《三线铁路与毛泽东时代后期的工业现代化》,《开放时代》2018年第2期。

⑤对于研究模式与研究路径问题,笔者将另文探讨。

参考文献:

[1]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大开发[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1,359.

[2]王培.六十年代中期中共转变经济建设方针的原由[J].北京党史研究,1998(3):24-27;董宝训.影响三线建设决策相关因素的历史透析[J].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1):89-93.

[3]郇锡文,张苹.对“三线”建设调整改造的一点认识[J].宏观经济研究,1990(11):90-93.

[4]林凌,李树桂.中国三线生产布局问题研究[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

[5]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

[6]何郝炬,何仁仲,向嘉贵.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

[7]李彩华.三线建设研究[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4.

[8]宁志一.论三线建设与四川经济跨越式发展[J].中共党史研究,2000(4):18-24.

[9]张凤琦.论三线建设与重庆城市现代化[J].重庆社会科学,2007(8):79-83.

[10]周明长.三线建设与四川省城市现代化[J].当代中国史研究,2014(1):51-58.

[11]张才良.贵州三线建设述论[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4):47-51.

[12]王佳翠.遵义三线建设研究[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

[13]周明长.三线建设与贵州省城市化[J].中共党史研究,2016(12):89-103.

[14]孙燕京,岳珑.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三线”建设与陕西工业[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36-41.

[15]汪红娟.甘肃三线建设述论[J].河西学院学报,2008(3):45-48.

[16]段伟.甘肃天水三线建设初探[J].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3):128-136.

[17]周明长.三线建设与宁夏城市化[J].宁夏社会科学,2018(3):128-138.

[18]周明长.东北支援与三线城市发展[J].开放时代,2018(2):12-29.

[19]黄巍.突破与回归:辽宁三线建设述论[J].开放时代,2018(2):30-48.

[20]段伟.安徽宁国“小三线”企业改造与地方经济腾飞[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3):85-91.

[21]胡悦晗.三线建设初期的工厂筹建:以国营4504厂为例(1968—1971)[J].贵州社会科学,2017(5):156-161.

[22]胡悦晗.地缘、利益、关系网络与三线工厂搬迁[J].社会学研究,2013(6):46-71.

[23]徐有威,李云.困境与回归:调整时期的上海小三线:以新光金属厂为中心[J].开发研究,2014(6):152-155.

[24]张勇,肖彦.三线建设企业选址的变迁与博弈研究:以四川三家工厂为例[J].贵州社会科学,2017(5):148-155.

[25]付令.三线企业的社会特征探微[J].重庆城市职业学院学报,2006(3):36-38.

[26]张秀莉.皖南上海小三线职工的民生问题研究[J].安徽史学,2014(6):145-153.

[27]徐有威,吴静.危机与应对:上海小三线青年职工的幸福生活:以八五钢厂为中心的考察[J].军事历史研究,2014(4):34-43.

[28]郭旭.社会生活史视角下的三线建设研究:以饮食为中心[J].贵州社会科学,2017(5):162-168.

[29]王毅.三线建设时期重庆地区内迁职工社会生活问题探析[J].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1):129-137.

[30]CHEN Chao.Toleration: Group Governance in A Chinese Third Line Enterprise [M].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31]陶宇.“家属工”:集体记忆中的制度变迁与身份实践[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2):167-175.

[32]吴海琳.单位制度变迁中身份认同的社会建构:以S厂“三线家属工”为例[J].人文杂志,2019(2):113-120.

[33]陈熙,徐有威.落地不生根:上海皖南小三线人口迁徙研究[J].史学月刊,2016(2):106-118.

[34]林楠,张勇.三线建设移民二代地域身份认同研究[J].地方文化研究,2018(2):52-58.

[35]袁世超,马万利.迁移、发展与融合:宁夏三线建设历史考察[J].宁夏社会科学,2019(5):186-193.

[36]张勇.三线建设移民的内迁、去留与身份认同[J].贵州社会科学,2019(12):39-46.

[37]张勇.区隔与融合:三线建设内迁移民的文化适应及变迁[J].江海学刊,2020(1):206-216.

[38]徐嵩林,陈东林.三线遗产概念、类型、评价标准的若干问题[C]//徐有威,陈东林.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二辑).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6:3-25.

[39]陈东林.抓住供给侧改革和军民融合机遇,推动三线遗址保护利用[J].贵州社会科学,2016(10):30-35.

[40]吕建昌.现状与研究对策:聚焦于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J].东南文化,2019(3):6-12.

[41]刘瀚熙.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价值评估与保护再利用可行性研究:以原川东和黔北地区部分迁离单位旧址为例[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2.

[42]刘凤凌.三线建设时期工业遗产廊道的价值评估研

究:以长江沿岸重庆段船舶工业为例[D].重庆:重庆大学,2012.

[43]任泳东.基于共生理论的贵州省绥阳县三线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3.

[44]左琰,朱晓明,杨来申.西部地区再开发与“三线”工业遗产再生:青海大通模式的探索与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45]谭刚毅,高亦卓,徐利权.基于工业考古学的三线建设遗产研究[J].时代建筑,2019(6):44-51.

[46]刘有安.孤岛文化背景下的移民社会文化适应[J].内蒙古社会科学,2009(5):126-129.

[47]张勇.历史书写与公众参与:以三线建设为中心的考察[J].东南学术,2018(2):223-232.

[48]张勇.社会史视野中的三线建设研究[J].甘肃社会科学,2014(6):116-119.

[49]张勇.介于城乡之间的单位社会:三线建设企业性质探析[J].江西社会科学,2015(10):26-31.

[50]BARRY NAUGHTON. The Third Front: Defence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Chinese Interior [M].The China Quarterly, No. 115 (Sept., 1988), pp.351-386.

[51]丸川知雄.中国的三线建设[J].亚洲经济,1993(34).

[52]吴晓林.毛泽东时代工业化战略:三线建设政治经济学[M].东京:御茶水书房,2002.

[53]LORENZ LÜTHI. The Vietnam War and China's Third Line Defense Planning befor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4—1966 [M].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2008, 10(1), pp.26-51.

[54]LI JU. Enduring Change: The Labor and Social History of One Third-front Industrial Complex in China from the 1960s to the Present [M]. Walter de Gruyter GmbH, 2019.

Review and Prospect of Research on the Third Front Construction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Zhang Yong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Law,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Abstract: Since the mid-1990s, the third front construction has gradually become a hot research topic, with research results emerging and research perspectives becoming diversified. At the macro level, the academic community mainly discusses the causes and background, implementation process, adjustment and transformation, evalua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third front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hole country; at the meso level,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third front construction and industrial layout,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small third front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gion; At the micro level,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historical events and impacts, social life and the third front population. In addition, the research on the third front heritage has become a new growth point; the related theoretical research is still weak; the research on the third front construction in foreign countries is relatively small. In the future, the research on the third front construction can be broken through in terms of data collection and utilization, research content broadening and deepening, research theory and method upgrading, research team building and cooperation with all sectors of society.

Keywords: the third front construction; multiple perspectives; review of research

(责任编辑 岩 芜)